

接受 的 复 调

赫金在其有生之年迎来了自己思想的复活节。随着一批批尘封已久的手稿重见天日，巴赫金的著述在不断的修订再版中传播到世界各地，巴赫金的思想遂成

为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财富之一，并被津津乐道——人们不仅惊异于其文论话语的独特、思维方式的怪异，更惊喜地发现无论是哪家哪派的思想（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读者反应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几乎都可从巴赫金那里找到思想的共鸣点。

不幸的是，虽然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表现出卓越的思想天赋，却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著述不辍，于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不能广为人知。但从另一方面讲，巴赫金又是幸运的，正当他已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与学术界隔绝的现实时，他的思想终于被人发现了，他的视野对它的发现。我们所要进入的，是巴赫金思想在中国的复调——就巴赫金而言，他的思想遭

Jieshou de Fudiao
de Fudiao

曾军 著 <

Jieshou
de Fudiao



接受的复调

曾军 著

——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 / 曾军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ISBN 7-5633-4628-7

I. 接… II. 曾… III. 巴赫金, M. M. (1895~1975)
— 文学理论 — 影响 — 当代文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I512.065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36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 680 mm × 960 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50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3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钱中文

近20年来,在我国,巴赫金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外国文学理论家、美学家之一。

对巴赫金的接受,在我国极为广泛。据说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他的文学、美学思想的论文,已有120多篇,有关他的专著,也已有5~6部之多,它们大多是博士论文。

我到一些大学讲学,不断有硕士、博士研究生找我商量,他们要做有关巴赫金的学位论文,并且和我讲到,巴赫金的文学理论、美学思想,使他们在理论知识、方法论上受益匪浅。特别有意思的是,有的大学的文学理论博士点,指定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文学理论必修课的精读文本,并让博士生逐章讨论,探讨巴赫金是如何把其思想贯彻于作家文本研究,得出独特的理论观念的,以及巴赫金在自己的著作里所得出的结论与他所研究的文本之间的真正的关系所在、差异和问题。这种经典性的学术著作的解剖式个案探讨,无疑会大大提高年轻学者的科研能力。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巴赫金的理论和西方各种文学、哲学思想曾长期被拒于国门之外,使得我们对外国的文化、文学、哲学思想的现状和进展一无所知。甚至到了80年代初,那时巴赫金的文学理论、美学思想早已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但我们对此仍然所知甚少。1982年,复旦大学夏仲翼教授译出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下称《诗学》)第1章,并在《世界文学》上刊出,随后巴赫金的著作的译本不断出版,有时一本

著作竟出现了几个转译的译本。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6卷本的《巴赫金全集》,成为我国巴赫金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该社不久即将出版《巴赫金全集》的第7卷。巴赫金著作的7卷本出版,将会完整地反映巴赫金著作的全貌。2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在我国,众人争说巴赫金,成了文学研究中一道好看的风景线。人们从各种社会思潮、文学流派思想、不同的学养积累探讨巴赫金,在撰写有关巴赫金学术思想的作者中间,既有文学理论家、美学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也有其他外国文学研究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家和一般爱好者。“对话”、“狂欢”这类巴赫金的话语,被不少学人广泛运用,几乎成了日常口头语,看来这种话语的“狂欢”和巴赫金研究的“狂欢”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巴赫金被我国学界如此广泛地接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他的文学理论思想具有理论的深刻的独创性,理论深度的专门性,以及理论广泛的开放性、当代性特征。

深刻的独创性,表现在自称是哲学家的巴赫金将其深刻的哲学思想融合进作家文本的细读与研究,赋予“对话”、“狂欢”以活生生的人的现实生存的含义,但又是彻头彻尾的文学文本意义,从而使得这一理论研究获得了深层的哲理性。他的理论的深度的专门性,表现在超语言学、话语思想、文本思想、话语体裁、小说理论等方面都有理论上的开掘和创新,一反原有文学理论的程式与规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他的理论的广泛的开放性,在于既深刻独创,又不自我设限,可与各种学派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各自受益,而被广泛接受。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著作,主要部分虽写作于四五十年以前,但至今读来仍感新鲜,它们有如针对当今文学理论中的问题在进行探讨,保持着理论的强烈的当代性特征。

人们看到,巴赫金的文学理论思想,明显地不同于同时期的苏联传统的文学理论思想,没有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气味,也没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封闭烦琐特征。它们探讨文学问题,视角新颖,观点独特,追根究底,深刻独创,具有宽阔的文化含义。特别是他的对话主义思想,他的关于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意义,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充实了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

曾军的博士论文,是对巴赫金在我国接受过程的一个探讨,论题本身

就很有意义。论文作者广泛地收集了我国学者关于巴赫金的种种论说,在资料工作上可以说做到了相当精细的地步。论文的重要特点,则在于它把巴赫金在我国的接受,与我国这时期的各个阶段不同背景的文艺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接受的结构,即包括现实主义诗学、当代形式美学、后现代文化诗学、当代文学研究的接受结构。这不失为一种眼光独到的切入点,它使得整个接受过程在表面的一团混沌中,显得井然有序、清晰和条理化起来,大体上符合并反映了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发展,显示了各个接受阶段的特征与问题,展示了巴赫金的理论的风采,深化了巴赫金的研究。

为了研究方便,找出巴赫金在我国接受中的各个阶段的各种特征,自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我看来又不能把这种划分加以绝对化,因为各个阶段的界线有时并不那么分明,并不那么单一,而是相互交叉渗透的。对于有的人来说,他闯入这一领域,纯属偶然,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就不是这样,这是其一。其二,巴赫金的原文著作不是现成的,即使在俄国也是零星出版的。他的7卷集,从1996年到现在,只出了4卷,并且不是依次出版的。所以有个阶段,我们只好收集到什么就介绍什么。其三,写作论文一般都有侧重点,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我的第一篇关于巴赫金的文章,两个月内要交稿,因此主要以“复调小说”和“独白小说”的分野、“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为切入点,体裁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无法顾及,但就不好说这一问题不在我的视野之内。1987年,《外国文学评论》创刊约稿,我想就巴赫金的叙事理论写几篇文章,于是先提交了一篇论文:《复调小说:作者与主人公》,副标题是“巴赫金的叙事理论之一”,然后再写关于他的长篇小说体裁思想、话语思想、时空体等问题。但文章发表时,编者将“巴赫金的叙事理论之一”删去,问及原因,说刊物不发连载文章,我也只好妥协作罢,而后就全力投入《文学原理——发展论》的收尾工作,没有时间考虑体裁等问题的写作。编者删去我的论文的副标题,倒好像是无形中解除了我的承诺,但并不是我不注意艺术形式的问题。

至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一场小小的争论,这是由于对方对于巴赫金的论著与术语,在没有多少了解的情况下提出的指责与极为主观的设想,争论本身意义不大,原想不予理会。但编者觉得好像抓到了巴赫金研究中的一种具有误导性的倾向,所以在按语中进行褒贬,并且多番鼓动,使

我只好应对。于是我只好对巴赫金著作的不同版本和术语,进行一番梳理,对照指谬。但这一过程却促使我思考了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很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即阅读中的“误解”与“误差”。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对于外来理论的启迪与借鉴,以及我们的理论自身的创新。“误差”就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提出异见,这对于理论创新来说是绝对必须的。但是没有理解就提出异见,那就是“误解”了,这可能会走到南辕北辙的地步,因此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当今我国有关巴赫金的研究,势头很好,不少年轻学者对此很有兴趣,这对于他们积累文学理论知识、训练文学理论思维、提高理论修养来说,应是一件好事。但也有令人忧虑之处,那就是不少人的研究与写作,是在单凭中文译本,缺乏外文知识、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的。俄语的资料从未见过,英文的资料并未掌握,整个巴赫金研究进展并不清楚,就在大谈巴赫金如何如何,甚至进行全面评说、传记写作,这就难免局限自己,进行低水平的重复。这是学术研究中的大忌,这种局面,恐怕是急需扭转的。

我参加过曾军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如今论文将要出版,我也感到高兴,这将会使我国巴赫金研究的后来者从中得到启迪与借鉴。

是为序。

2004年4月16日

王先霏

时间过得真快，曾军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好像是在昨日，掐指一算，他毕业却是已经两年多了。两年多来，当时参加过他的论文答辩会的老师，评阅过他的学位论文的老师，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钱中文老师，南京大学的赵宪章老师和周宪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的陆贵山老师，当然还有他的母校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的老师们，都对他的论文的修订和出版表示关心。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过认真审读、慎重研究，要在今年湖南湘潭“巴赫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之际，公开出版曾军的学位论文，向国内外学术同行推介，这是使人十分快慰的事情。

曾军学位论文的选题几经变化，最后确定这个题目，当时我和他心里并不踏实。我那时给他们开了一门学位课“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叫作一门“课程”，其实是大家一起读书、讨论。讨论也就是“对话”，他们年纪轻、精力集中、通一点外语，比我读得细，比我读得深，比我的体会多。大家都对巴赫金产生了强烈的和持续的兴趣，主要是被这位异国学者的学术人格深深打动、深深吸引。比起西欧北美的文论家，巴赫金所处的环境和我们所经历过的文化环境有更多的相近之处，在其坎坷的一生中，在单一的封闭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禁锢中，既不尾随威赫一时的强势话语，也不是情绪化地作一种矫激之论，更不是照搬国外的时髦理论，而是长期坚持学理性的独立思考，构筑迥异于他人的极富创造性的一家之说——这些，正是我们所欠缺的。一百年来，我们学习日本的、欧美的、俄苏的文论，到

了20世纪末,却发现“失语”了,岂不是应该深刻反省吗?

当然,我们并不是没有努力,也不是没有收获、没有进步。一百年的理论批评史,留下不少可贵的成果;近20年的理论批评史,也留下或深或浅的足印。全面回顾和评述很难,何妨以“巴赫金接受史”为线索,对我们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艰难历程,对其中的得失,作一番分析呢?这正是我们那门课程的宗旨。曾军在文章中说,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形成了同构性的关系,进而对西学新潮下中国文论话语如何应对西方学术强大影响力的问题进行了尝试性回答”。几句话表达出文章的立意,他从巴赫金接受史来观察中国文论的转型,我以为是很恰当的。

确定题目之后,是怎样做的问题。我当时对参加这门课程的同学说,巴赫金的著作,特别是《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两部著作,可以作为学位论文的范本。科学研究要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推进,首先必须广泛搜集、认真研读在所定题目上学界已有的成果。巴赫金说:“研究四个世纪以来对拉伯雷的理解和阐释,及其影响的历史,是颇有教益的。”他的另一部著作的第一章的标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著述对它的阐释”。他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下了很大功夫,对前人成果的评述,是他论著的起点,也是非常精彩的部分。精心研究已有成果,才有可能超越,才有可能创新。我曾看见有的学位论文,好像是在白茫茫的空地上工作,无视此前学者的立论,这种做法我以为是不可取的。曾军对资料的收集,态度严谨。好在巴赫金的中国接受史,到他写这篇论文时,只有20年,让血气方刚的他立下把所有已发表的相关文字穷而尽之的宏愿。后来的事实是,直接的材料,他是找了很多,专家们也不易指出遗漏。要说一网打尽,毕竟也难以做到。那段日子,只要与巴赫金有关,曾军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除了书面材料之外,他更直接向发表过相关文章的学者调研。他在细读了别人的文章之后有的放矢地去请教、讨论,得到了学者们热情的回应。本书征引了部分学者给他的信件,是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的宝贵资料,这些信函大大拓展了他的思路,内行们的肯定也使曾军和我对论文逐渐增强了信心。

中国的巴赫金研究者,是健在的当代学者,其中多数是曾军的师长辈,不少是深孚众望的大家。曾军对他们十分尊敬,但作为研究者,在写作中还是把这些先生看作研究对象,把他们的论著放在2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进程中客观地评价,包括指出20年来对巴赫金介绍阐释中的缺失。对学者的尊重,就是力求冷静地科学地对待其论著,平等地与之讨论。在讨论中,在争论中,学术才能健康地发展。

从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看,更不要说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研究看,曾军的这篇论文,做的都是初步的工作。我曾向一位热忱关心曾军学术发展的老师说,曾军还很年轻,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历练。这两年,他做出了颇为实在的成绩,也多了一些人生体悟。他很幸运,总有那么多老师提携,帮助他开辟更广的发展空间,而他自己始终很勤奋,有这两点,使我对他今后的进步满怀信心。

在杜瓦金对巴赫金18个小时录音访谈结束时,巴赫金用德语背诵里尔克的诗,其中两句是:

这便是愿望:愿望静静地对话,
时时刻刻地对话,直到永远。

让我们把这作为文学理论工作者的一条格言吧,让我把这作为对曾军的期望和祝愿吧。

2004年3月12日植树节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导 论

第一节 西学新潮中的巴赫金接受史:写作的缘起及其目标 / 1

1. 为什么要研究巴赫金接受史? ...1
2. 研究巴赫金接受史是否可能? ...3
3. 撰写“巴赫金接受史论”如何可能? ...5

第二节 接受的复调:接受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预设 / 8

1. 接受史研究的几种模式...8
2. 复调的接受史:尝试建立一种多元的历史描述框架 ...11
3. 接受史研究方法的预设及其相关概念...13

第三节 中国的巴赫金接受背景 / 17

1. 第一层背景:巴赫金难题及其可能的陷阱...17
2. 第二层背景:巴赫金在世界的接受状况...20
3. 第三层背景: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前史...23

第一章 巴赫金与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诗学 / 26

第一节 意外的收获: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巴赫金 / 26

1. 意外的收获:巴赫金首先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引入...26
2. 第一个声部:复调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29
3. 转变的痛苦:中国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延续性接受”...35

第二节 对话的先声:钱中文和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争论 / 38

1. 接受的自觉:对巴赫金理论的正向“介绍—研究”...38

2. 赞成和反对: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对话…44
3. 对话的先声:争论中的接受自觉…49

第三节 必要的误差:复调与中国现实主义诗学重建/51

1. 必要的误差:修复“复调/独白”断裂带的努力…51
2. 走出“别车社”:巴赫金之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潜在性影响…56
3. 暗中的论辩: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与中国的文学主体性问题…59

第二章 巴赫金与中国当代的形式美学/65

第一节 立场的选择:巴赫金与中国的形式主义批判/65

1. 第二个声部:接受视野西方化的开始…65
2. 形式的展开:对以“时空体”为代表的小说理论在接受…72
3. 批判的立场:中国—巴赫金—形式主义…76

第二节 理论的创新:以“对话性”为中心建构叙述理论的可能性/82

1. 再登巴比伦塔:董小英建构新的理论体系的努力…82
2. “对话”与“叙述”:以“对话性”为中心建构叙述理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85
3. 理论创新:作为接受史问题的意义…90

第三节 重译与沉默:同期对巴赫金关于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的接受/93

1. 重译的奇观:一连三个译本…93
2. 沉默的尴尬:中国—弗洛伊德—巴赫金…96
3. 可接受性:关于《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的考辨…99

第三章 巴赫金与中国当代的后现代文化诗学/102

第一节 理解的螺旋:走向后现代文化诗学的巴赫金/102

1. “接受的多声部性”:第三个声部与前两个声部之关系…102
2. 接受的同轨:“世界眼光”与“难以定位的巴赫金”…107
3. 理解的螺旋:接受者的主体间对话…110

第二节 形象的建构:刘康及其对巴赫金理论的整体接受/113

1. “海外中国”:刘康的复调接受视野…113
2. 形象与思想:对巴赫金生平与学术历程的接受…118
3. 对话意识:文化转型与巴赫金语言杂多的文化理论…123

第三节 命名的意义:巴赫金与后现代文化诗学/127

1. 命名的意义:巴赫金接受中的同化与归化…127
2. 话语的纠缠:言语体裁理论/话语体裁理论? 言谈理论? 社会符号学? 话语理论? 超语言学/元语言学/转换语言学? …129
3. 视角的转换:程正民、夏忠宪等人的狂欢化研究…142

第四章 巴赫金与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150

第一节 应和与超越:中国对巴赫金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150

1. 思维的点金术:接受史另一个声部的展开…150
2. 整体性比较:中国对巴赫金文学研究方法论反思…153
3. “改写”现象:张杰及其对巴赫金批评理论体系的探讨…160

第二节 还原与叛逆:巴赫金文论在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中的运用/165

1. 还原与叛逆:接受史中的“运用”问题…165
2. 平移或斜移:巴赫金与中国的文学文化研究…169
3. 反驳和辩证:巴赫金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175

第三节 走向交往对话:巴赫金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重建/180

1. 接受的接受:中国—托多罗夫—巴赫金…180
2. 对话批评: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183
3. 文论重建:钱中文等人及其对“对话的文艺理论”的倡导…186

结 论/192

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资料目录(1980~2001)及其他参考文献/199

附录1 巴赫金文论中的“技术”思想/208

附录2 方方小说中的“潜对话”现象/235

附录3 荤笑话的表演性与中国民间诙谐文化的狂欢化问题/245

后 记/252

导 论

第一节 西学新潮中的巴赫金接受史： 写作的缘起及其目标

一部接受史，也就是一部思想的复活史。在留给人们的最后的遗言中，巴赫金表达了对于这种思想复活的坚定信念——“不存在任何绝对死去的东西：每一含义都有自己复活的节日。”^①巴赫金思想的复活则得力于巴赫金独创性思想的魅力，有赖于接受者一代代的传承，有待于新的视野对它的发现。本文所欲论及的，是近 20 年来中国的巴赫金接受情况^②，也就是巴赫金思想在中国的复活史。不过，在正式进入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下面几个问题作一个简要的交代：为什么要研究巴赫金接受史？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是否可能以及这种研究如何可能？

1. 为什么要研究巴赫金接受史？

第一，这当然来自于巴赫金本人及其思想的诱惑。就巴赫金而言，他的思想遭际是不幸的，虽然他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就表现出卓越的思想才能，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著述不辍，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他的思想如同他本人被放逐在边远的库斯塔奈一样，长期被埋没于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不能广为人知。但从另一方面讲，巴赫金又是有幸的，正当他已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与学

① [俄]巴赫金：《在长远时间里》，《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392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② 本文所研究的是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情况，为行文方便起见，除必须与世界的巴赫金接受史状况进行比较之外，均简称“巴赫金接受史”。

术界隔绝的现实时,他的思想终于被人发现了,巴赫金在其有生之年迎来了自己思想的复活节。随着一批批尘封已久的手稿重见天日,巴赫金的著述在不断的修订再版中传播到世界各地,巴赫金的思想遂成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财富之一,并被人津津乐道——人们不仅惊异于其文论话语的独特、思维方式的怪异,更惊喜地发现无论是哪家哪派的思想(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读者反应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几乎都可从巴赫金那里找到思想的共鸣点。巴赫金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入中国之后,至今已历时二十余年,亦从未中断。从对其只言片语的译介到《巴赫金全集》的出版和对巴赫金思想的整体研究,中国的巴赫金接受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如此,随着对巴赫金的接受,巴赫金独特的理论话语和思维方式吸引了更多的文学研究者,他们积极与之对话,以之与西方当代文论进行对话,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扩大。巴赫金接受史在中国何以发生,如何发生?这构成了本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二,巴赫金的生长土壤与中国有着同形同构性。巴赫金的学术历程始于十月革命的炮声之中,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巴赫金同其他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思潮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也经历了思想专制、万马齐喑的时代,同样,当他垂垂老矣、心如止水的时候,巴赫金的思想又在俄罗斯的“解冻”中被人拂去岁月的尘埃。20世纪的中国亦复如是,“解放—集权—解冻”的轨迹在中国同样是清晰可见。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社会历史背景极为相似的情况下,俄国产生了巴赫金,而中国却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能与之媲美的人文学者和思想者?本文无力透彻地回答此问题,但它作为萦绕于脑际的疑问,却成为本文写作的内在冲动。

第三,20世纪末的西学新潮是研究巴赫金接受史的思想文化背景。首先,这一背景决定了:一方面,只有将巴赫金接受史置于西学新潮的背景之中才有可能解释清楚巴赫金接受史何以发生以及何以如此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巴赫金接受史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西学新潮中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种种规律性的东西,使我们更好地阐释其他接受现象,研究应对的策略。其次,中国近150年来“西学东渐”的背景是导致中国文学观念文论话语转型的最为重要的文化生成语境之一,对中国接受外来文论话语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理解,如果从各个历史时期挑出有代表性的外国文

论的接受史研究,则可以点带面地反映出西学东渐对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影响是如何形成的,从而为重建中国文论、更有效地开展与世界文论的对话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这一宏大课题之中,巴赫金接受史构成其中的重要部分。再次,在文化传播、文论接受过程中,“西学西传”、“东学东传”是基本的传播方式,但也不尽然。梁启超“西学东传”说揭示了早期“西学东渐”中西学假日本之途进入中国的一种规律性现象;而在巴赫金接受史中还有着“东学西传”现象,即源自东方的巴赫金文论思想(虽然其思想的根底有着西方的如康德的影响)更多地通过西方这一渠道传入中国,中国在接受巴赫金过程中,西方化视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巴赫金接受史在西学新潮大背景之下,便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和性质。这一特殊性在于:为什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第一次发现巴赫金时,具有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方便的文化传播渠道的中国接受者却无动于衷?为什么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接受巴赫金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本文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2. 研究巴赫金接受史是否可能?

研究巴赫金接受史是否可能的问题只能由对象所留下的材料来决定。

第一,从世界范围上来看,对巴赫金的接受已有四五十年,中国对巴赫金的接受也有了20年的历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在巴赫金原著的翻译介绍方面,从最早的只言片语到《巴赫金全集》的出版,中国在巴赫金接受的原始材料的积累上成效显著。一方面,巴赫金的一些重要论著及论文在中国已有了不止一种译本,如巴赫金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在中国即已有了4种译本。它们分别是张杰、樊锦鑫译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汪浩译的《弗洛伊德主义评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佟景韩译的《弗洛伊德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以及张杰、樊锦鑫译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巴赫金全集·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拥有两种译本的那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就《巴赫金全集》的出版来说,其收集材料之全足以与俄国的巴赫金著作出版媲美。从中国对巴赫金文论思想的研究来说,从1982年至2001年,已发表专题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5部(其中一部即将出版),涌现了一大批巴赫金研究学者,而且这一数目仍在扩大。同时,在翻译介

绍国外的巴赫金研究方面,中国已翻译出版了2种巴赫金传记^①,翻译或介绍了大量国外的巴赫金研究专论^②。此外,国内已经举行了3次巴赫金专题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巴赫金接受的深度和广度。^③

第二,在巴赫金接受史中,即不断有学者对巴赫金接受现状和接受现象进行回顾性的总结和反思,这使得巴赫金接受史一直处于相当自觉的接受状态之中。这里既有赵一凡的《巴赫金研究在西方》(《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夏忠宪的《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一瞥》(《俄罗斯文艺》,1995年第4期)、董小英的《俄国巴赫金研究现状》(《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董小英的《一只装满了线团的篮子——巴赫金研究的俄国现状及发展方向》(《外国文学动态》,1997年第4期)、牧野的《国外巴赫金研究一瞥》(《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4期)等对巴赫金在俄国和西方的研究现状的介绍,^④又有晓河的《巴赫金研究在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6期)、李斌的《国内巴赫金研究述评》(《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

① 它们分别是:[美]克拉克·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000;[俄]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张杰、万海松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

② 比较有代表性的介绍性文章有——何百华:《托多罗夫谈巴赫金》,《外国文学报道》,1986年第1期;森原:《巴赫金: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评柏纳德·唐纳尔斯的新作》,《国外文学》,1997年第1期;晓河:《巴赫金学说“寻根”》,《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翻译的巴赫金专论有——[美]唐纳德·范格尔:《巴赫金论“复调小说”》,熊玉鹏摘译,《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俄]卢那察尔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一书说起》,干永昌译,《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美]詹·迈·霍尔奎斯特:《巴赫金生平及著述》,君智译,《世界文学》,1988年第4期;[英]托尼·贝内特:《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张来民译,《黄淮学刊》,1991年第2期;[加拿大]克里夫·汤姆逊:《巴赫金的对话诗学》,姜靖译,《国外文学》,1994年第2期;[英]格雷厄姆·佩奇:《巴赫金、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张若桑译,《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法]托多罗夫:《巴赫金思想的三大主题》,唐建清译,《文论报》,1998年6月4日;[俄]B.C.瓦赫鲁舍夫:《围绕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悲喜剧游戏》,夏忠宪译,《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3期;[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③ 它们分别是:1993年的“巴赫金研究:西方与中国”研讨会、1995年社科院举行的纪念巴赫金诞辰100周年的圆桌会议、1998年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

④ 专著如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夏忠宪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第8章第6节(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文章如彭克巽的《巴赫金的小说创作美学》(《苏联文学》,1988年第6期)、钱中文的《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凌建侯的《话语的对话性——巴赫金研究概说》(《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5期)等。